



# 高加索的烽火

# 高加索的烽火

季寿山 著

楊逸麟 插图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0年·北京

# 高加索的烽火

季·寿山 著

楊逸麟 插图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十二条胡同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787×1042 1/32 3 1/8 印张 2 插页

1960年2月北京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 定价(4)0.29元

## 目 次

關关东.....	1
做苦工.....	11
彼得洛夫.....	23
参加赤卫队.....	31
八月事件.....	40
格罗兹内百日战.....	51
挫折.....	55
逃亡.....	63
打游击.....	72
反攻.....	76
更高地举起红旗.....	88

## 闖 关 东

1898年，我誕生在山东省平度县小吳家村一个貧农的家庭里。兄弟姐妹五人的連續降生，使一貧如洗的父亲負担更重了。我們劳动了一年，庄稼剛收到家里，都被狠心的地主搶去了。我的家庭很快地走上了中国千万个农民家庭的悲慘的道路——先是借債，然后是彻底破产。我九岁那年，母亲終于因貧病交迫和我們永別了。父亲一把眼泪一把汗，苦苦地把我們拉扯大。到我十四岁时，父亲哭着把我和哥哥送上了大路，讓我們出外自尋活路。从此，我离开了交織着血泪和苦难的家乡。

我先到烟台，找到了哥哥，在一个鏡子鋪里当学徒，受了許多折磨。不久，就和哥哥去安东。关东，乡里人談起这两个字，头皮就会发疼。多少人家的亲人，一去不返；多少人家的亲人，从此失去了音訊。可是，关东却又在走投无路的人們面前露出一絲誘惑的光芒，每年每年，仍舊有一批一批的人往那里跑。是呀，即使是鬼門关也得去闖，总比在家里挨餓強些。我在輪船上，望着白茫茫的大海，心里也感到茫然，不知道在大海的彼岸，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。我們沒錢买船

票，又沒有躲过查票人的眼睛，被抓起来揍了一頓，关在厕所里。不过，对穷人來說，关在厕所里又有什么，我畢竟到达了关东。

按照地址：“索家大院”，我找到了哥哥。原来他住的是用葦草搭起来的房子，墙上糊上些泥巴，地上鋪着些碎草。哥哥告訴我們：姓索的財主搭了好多这样的房子，租給劳工住的，一間屋，一月租錢三块，別看屋子不景气，一間屋却要人挨人住上十多个呢。我苦笑了一下，就在哥哥身旁放下了自己的鋪盖。

从此，我投入了安东的生活斗争的激流。为了活命，我什么都干。我卖过野菜，給人烧过开水，做过飯。第二年，我在一家旅館里帮厨。我还幻想着能够积蓄一点錢捐回家去，就請掌柜的把我每月的工資記在賬上，以后一起支領。好梦做了五个月，当我向掌柜的支取五个月的工資时，他見錢多了，貪心頓起，馬上翻臉誣賴我哥哥偷了他的木炭，連吆喝帶恐吓，把我轟了出来。当时我才十六岁，人地生疏，吃了这个苦头，心里恨，可又拿他沒有办法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又到“渡边洋行”安东分行去做木屐。五个月后，因为买卖蚀本了，分行关了門。我又是一文沒有捞着。心里气得很，发个狠心，和一个姓崔的作伴，赶到大連找“渡边洋行”总店的掌柜要工錢。他說已經給了工头；我又去找工头，那家伙把我騙到家里，今天推說銀行头寸紧，明天推說朋友挪用了，一直留难了五天。最后一天，我們又去問他时，他臉上的橫肉往下一挂，對我說：“我

还欠你什么錢？我們已錢賬兩清，請走吧。”我听了猛一楞，急巴巴地說：“你这是什么話？”他冷笑一声說：“你在我家住宿、吃飯，难道不出錢嗎？一天五塊錢，不多算你的，五五二十五，正好和你的工資相抵。”听了他的話，我头里嗡地一声响，眼前頓时天旋地轉，我咽口唾沫想定定心，可还是急得一个字也說不出来。我挽着袖子想揍他，这时，屋里闖出几个大汉来，一只大手往我肩头一抓，就象鉄鉗子似的，骨头被捏得格巴格巴响。工头連連冷笑着說：“識相点，咱們交朋友；你要是敢动一动，当心你的两排鸡肋骨。”

我喪魂失魄似地走出了工头的家，信步来到海边，坐在石堆上，听着潮水从石隙間退去，发出細微的嗚咽声。海水映着夕阳，一片血紅，房屋的黑影，仿佛一排排尖利的牙齿，这个恶鬼似的社会，真是吃人不眨眼呀！

后来，我有个姓馬的同乡要回老家，叫我頂替他到一个小飯鋪去做飯。虽然我受了几次騙，开始領略到黑暗社会的殘酷了，可是想起了衰老的父亲，我还是忍气吞声地干下去，总想掙几个錢，捐給他老人家。

1916年四月間，父亲突然来了，一見面，就劝我回去。大概他已經从哥哥那儿知道了我这几年的不幸遭遇。就这么回去嗎？空着手出来，混了三年，还是空着手回去！这太丢人了。我把心一橫，暗暗发誓：不！决不回去！就是遇上老虎，我也要从它的牙縫里夺回点肉渣渣来带回去！要不然，就讓老虎活吞了，也决不回头！家乡，我多么想念，弟弟們也許长

得更高了……。可是現在，我決不回去！

父親苦苦勸我，滿是皺紋的臉痛苦地抽動着，眼淚象淌水似地滴在我手心上。三年來，父親顯得蒼老多了，鬢間出現了不少白髮，粗糙的手微微抖動着，茶碗也捧不牢了……。我心裏一酸，不覺也淌下淚來。

這年的五月十三日，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個日子。從這天以後，我就再也沒有看到受盡折磨的父親了。那天早晨，天蒙蒙亮，我揣了兩個苞米餅子，直奔大連灣渡口。向海上瞪了一眼，摸摸身上的兩毛錢，心一橫，一步跨上了渡船，由它向前開去。當我再踏上陸地的時候，除了幾件破爛衣服，我真是這地的“一無所有”了。

上哪裏去呢？我想：去哈爾濱。其實我是走投無路，隨便挑了這個聽來的地名。有個目的地，心中就好象有了朦朧的希望。沒錢吃飯，只好沿路找點野果子充飢，渴了就到池塘里捧點冷水喝。有時給人家打零工，吃一兩頓飽飯。白天趕路，晚上就在路旁睡覺。

一天，我因為連日飢餓疲勞，正走着路，忽然眼前一黑，一頭栽倒在路邊草棵裏，失去了知覺。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，突然感到一個冰涼的東西貼到腦門上，頓時心頭就象拭掉一層霧氣，清爽起來。我微微睜開眼，看見一張黃褐色臉，正和善地望着我。我想掙扎起來，却被按住了，不讓動。過了一會，那人又舀來一瓢水，扶起我喝下去。接着，又把一塊苞米餅子塞在我手裏，說：“吃吧，老鄉，你是餓昏了。”我看看他那



和善的眼睛，便大口地把餅子吞了下去。

肚子里有了点食物，人立刻有了精神，我这才仔细地把他打量了一番：他穿的也是一身破烂衣服，满下巴黄胡子，眼睛明亮。宽肩厚背，个子挺高，往当地一站，好象一截树桩，两只大手毛茸茸的，好象连石头也能捏碎。我很自然地对他羡慕起来，假如我能够跟他在一块，就有依靠了。于是我急促地问道：“大哥，你贵姓，上哪去？我跟你一起走好不好？……”

他嘿嘿地笑着说：“老弟，别着急，你歇一下，回头再说吧！”

以后，我就跟他一路走，这才知道他名叫彭世荣，山东蓬莱县人，想往北方的城市去闯闯。他比我年纪大，懂的事比我多。我从十四岁离家，饱受酸甜苦辣，现在有这么个知心着意的人，和自己在一起，好象有了个靠山，心也落了实。我把他当亲哥哥看待，他也处处照顾我，体贴我。晚上，露宿野外，我被冻醒，常发觉他悄悄把自己的破衣盖在我身上。弄到吃的，也交给我，他自己却偷偷跑到河边喝冷水。我第一次感觉到人间的温暖，忽然觉得世界原来是这样美好！

途中，为了维持生活，我把棉袄当了四毛钱，他把他仅有的一个布袋也当掉了。就这样走到了辽阳。在辽阳，我们干了几天零工，继续往北走。走了一天，第二天刚上路，我的腿肿了，再也走不动了，身上一个钱也没有，耽誤下去也不是回事。彭世荣正在着急，忽然看见大路上来了三十多个人，都是穷苦人的模样，为头的一个手里拿着一面小旗。彭世荣赶上

去一問，原来是替俄国招收铁路工人的。我听了心里一劲，便仔细地向他们打听。据说：到俄国去做工，一天给两块羌帖（卢布），一年以后管送回国。这三十多个人都是报名去修路的。我想：反正在中国也没有活路，有这样的好差使，为什么不去？彭世荣也赞成我的主意，两个人便一起报了名。那个拿小红旗的人，掏出两块干饼子，给我们当早饭。据说他替俄国人招一名华工，就能得到一块钱。我们这伙人在路边歇了一会，就向沈阳走去。

到达沈阳的第二天，招工处的管事的就来检验体格。那时候，我们穷苦人根本不被他们当人看待，凡是检查合格的，就在工人背上打一个戳记，就象对待猪獠那样。不合格的，都被打发走。我和彭世荣都合格，光脊梁上盖上蓝印，当天下午就被送上红色的拉货用的车厢。彭世荣气得把一对大手捏得格巴格巴响，吐着口水咒骂。我劝他说：“管他呢，他要盖印就让他盖好了，又伤不了我一根毫毛。”彭世荣愤愤地熊了我一顿：“你懂个屁，这是对咱们做工的侮辱！”我望着他那对明亮的眼睛，这时象有两簇火苗在闪动。我还是弄不明白，平时那么和善的彭大哥，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会这样恼火！

火车开动了，磕登磕登，吵得没法睡觉。第一次坐火车的好奇心理，到夜里便已经消失了。我只是想着：这个闷人的木笼子，将要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呢？等待着我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？……

到达哈尔滨，才知道俄国人在天津、大连、营口、沈阳各

地，都招了很多华工，哈尔滨是个集中的地点。我們在哈尔滨住了两天，等各地华工到齐，又受到一次体格检查。这次是用鉛絲圈套在人的手腕上。彭世荣气愤地说：“这不是給我們套手铐嗎？我們犯了什么罪？”說着，又用眼睛扫視大家。工人中有的人低低地咒罵着，大多数都低着头，一声不响。体格检查完毕，我們又被帶去洗澡，每人发給两套衣服：一套衬衣，一套是灰罩衣，罩衣胸口，有白布圓圈的标志。然后便排队上火車。車廂門外搭着一條跳板，我們挨次上車，管事的就在跳板边发給每人三块钱。每节車廂乘三十五个人，人一上滿，他們便把跳板拉掉，鉄門拉攏，派警察看守住，誰也不許乱动了。

列車上，有一个俄国总管，这人約莫三十来岁年紀，脸色紅得象煮熟的虾子，眼睛直溜溜地瞅瞅这，瞅瞅那，一天到晚对着那个通事咕嚕个不停。另外有几个中国的大柜（工头）跟在俄国人后边，一听到通事翻譯了总管的話，馬上就指手划脚朝各車廂嚷叫。各个車廂都有一个小工头，这是我們的頂头上司。車廂里分底、中、上三层鋪，只有四个高高的小窗戶，白天也是昏黑昏黑的。我們三十多人挤在一起，每天吃的是黑面包和菜湯，生活很坏。那些工头还攬撥工人們賭錢，他們抽头。有些工人从賭博場出来，把剛发的几个錢都輸光了。

我每天沒事干，光想着亲人。想到在大連不辭而別，父亲和哥哥不知道多么伤心呢！想到在山东的弟弟，和那伙子苦命的穷人。但是，我并不悲伤，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从来不知道的国家。“一天两块羌帖”，这句话，象鉄釘子釘牢在我心

中，我一家人的溫飽幸福都似乎有了着落。

然而，這一縷幻想很快也破灭了。在滿洲里附近的一個車站上，有一個留辮子的中國人好心的告訴我們說：“到俄國煤窑去干活不好，整天不讓上來，弄得眼睛都瞎了，並且外國警察看得緊，跑了就抓！”這個善良的人，當時就被工頭抓走了，但是他的話却在我們中間引起了波動和恐懼。到了滿洲里，有人就偷跑了；但是不幸又給抓了回來，還挨了一頓痛打。這以後，工頭們對我們的看守就更嚴了，到站時不讓走遠，甚至根本不讓下車，想跑也跑不掉了。

火車象醉漢似地，在遠東的綿長的鐵道上行駛着。窗外亮了又黑，黑了又亮，日子過得象老牛爬的那樣慢。我時常爬到窗口，好久好久地看着陌生的異國的山川，那廣闊的光坦的荒原，無邊無際，我的命運也象荒原那樣不可捉摸。

一天，車開到一個名叫久明的車站停下了。這天，我們車廂輪到我和彭世榮去打開水。各個車廂打開水的工人，按照習慣，都排着隊依次打。這時，突然有兩個沙皇俄國的兵士也提着開水桶跑來，見擠着這麼一堆人，一個便連拖帶踢，另一個用槍托搗，想把我們趕開。彭世榮眼睛上挨了一槍托，一跤跌倒在地上。他一個鯉魚打挺，縱起身，一拳就朝那兵士頭部打去，把他打得踉踉蹌蹌退去好遠。這一下事情弄大了，那兩個兵士哇啦哇啦吼着，舉起槍直朝彭大哥沖過來。我見來勢不對，趕上一步，站到彭大哥身邊，這時，許多打開水的華工都站到前邊來。那兩個兵士見我們人多，連忙縮住腳；我們往前

一逼，他們吓得扭身就跑了。一会儿，就从列車最后那节車廂喊來了七八個人，和我們打起來。這一下把大家氣火了，彭世榮吼道：“弟兄們，俄國兵欺侮咱們工人了，快來呀！”華工們紛紛從車廂里跳下來，圍住那幾個兵士，你一拳，我一腳，直打得馬仰人翻。那個俄國總管趕來排解，幾個兵士才從人縫里鑽跑了。

彭世榮的眼睛里燃燒着兩團火，下巴上烟色的胡子也好象硬錚錚地豎了起來。他把毛茸茸的大手一舉，喊道：“弟兄們，咱們工人就這樣象兔子似的，白白受他欺侮不成！不行，回去要飯吃，也比挨欺負強，不干了，有種的跟我來！”他往車上一縱，馬上把鋪蓋抱下來，往地上一擡。大家都嚷叫着爬上車取下行李，也擡在地上。六七百個華工都坐在地上不肯走了。

那個俄國總管見了這情景，臉色都變了，又聳肩，又攤手，跟翻譯咕嚕了一陣，那翻譯便跑來對大家說：“總管答應和車站交涉，請大家等一等。”

原來，我們去俄國的時候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。沙皇政府迫使許多俄國人民離鄉背井，到遙遠的地方去賣命，鐵路軍運頻繁，我們的列車不得不常常停下來讓路。現在掛在我們列車后面的，是一節裝載着德國俘虜的車廂，那些俄國土兵便是押解這些俘虜的。

過了好大一會，那個總管才匆匆地從站長室走出來，對大家說：“已經交涉成功了，站長同意把后邊那节軍用車丟下。”

翻譯最后还強調說：“总管向大家道歉，希望大家还回到車上去。”

彭世榮好象已經成了我們的当然代表，他把大手一劈，說：“要他保證，以后再也不准发生侮辱咱們工人的事！”那个总管連忙点头說：“好好，可以保證。”

大家这才抱着鋪盖回到車上去。这事发生以后，我想了好久，許多問題我还无法解释。比如說：那个俄国总管怎么忽然变得溫和了？車站上怎么能答应把一节軍用軍丟下？……但是，我也朦朧朧朧地感觉到：咱們做工的人，也是不好惹的。对于彭大哥，我更加尊敬了，我覺得他待自己人心地好，对有权勢的人又是一身硬骨头。

我們的列車走走停停，整整四十天，才到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(Архангельск)。这时正是1916年七月。

## 做 苦 工

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已經有不少中国工人，他們都是不久前才从中国来的，因为没有輪船，都在这里等待。这里是俄国欧洲部分的北方，虽然是七月間，气候却很凉爽，而且太阳整天不落，晚上就象白天一样，他們告訴我这就是“白夜”。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景，觉得很新鮮，半夜里还爬起来到院子里看。日間沒事做，有些人就賭錢玩。我一直記着彭大哥的嘱咐，不去学它，沒事就上街玩，或者找点零工做。

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等了一个多月，才来了輪船。我們便被送到东南方的穆尔曼斯克（Мурманск）。沙皇政府为了从英、法、美等協約国运入軍用品，要在这里赶修一条铁路，据说有好几万华工被送到这里来。

船在一个山崖旁靠了岸，我們用鉄鍬、鏟头斫开一片空地，做了临时碼頭。在这里，管事的发給我們每两人一桶牛油和一袋面包，然后即分头向各队負責的工段进发。

我們这一批被分配在最北边的工地上。一路上尽是密扎扎的林莽，陷人的沼泽。我們不得不用斧头开路，并且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。弄得大家精疲力尽，一夜才走了十八里。

我們終於到达了鐵路局事先筑好的工房。这一段工房又分三个区，中間一区是工程师、管理处、铁工等的住地，我們几个班共約三百来人，住在北边的一区。南边的一区住的是战俘。我們的住房是两排“邦那克”（木头垒墙、木板頂的俄国式屋子）。我們避住的这一排屋子，头上用木板隔开一間，住着木匠夫妇，每排屋子都有俄国监工。早晨他們就敲着一段铁軌，一边喊：“赶快出来，上班啦！”

工作是沉重的：斫树做道木，抬土筑路基。每天从早晨七点鐘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鐘，要干十二个小时。北方的夏季很短，从八月起就开始下雪，到了十一月，雪更下个不停，終日不見太阳，天地間一片漆黑。这时候，一天只能干三个小时活，早晨趁天有一点亮，就提着灯去上工，工地上則靠篝火照明。下工回来时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們这个工段上，除了华工外，还有不少德国和奥匈帝国籍的战俘，他們也和我們一样，做着沉重的工作。

可是，沙皇政府的爪牙們，却又巧立名目，百般地尅扣我們的工資。在中国招工时，明明說的是每天两块羌帖，但是到这里，我們每月最多只能拿到三十多个羌帖，少的还有拿十几个羌帖的。这还是按夏天十二小时計算的。冬天干三小时活时，每月工資更低了。尅扣工資还不算，錢发到手里，工头們便引誘大家賭錢，从中抽取头錢。我不会賭博，他們就硬拉我下水，还說：“往上押錢你总会吧，来吧来吧！”我和彭世荣等几个人，搖搖頭走开了，可是有很多华工却把工資輸得一干二淨。



冬天冷得很，虽然发给我们黄棉袄、乌拉鞋和棉帽，可是还冷得伸不出手；木头房子更是四面透风，一个小洋铁爐子，根本抵不了大事，夜里，一个个睡得象虾公公。吃的就更坏了。起先还能吃点馒头，后来就只有黑面包了；菜，特别是新鲜蔬菜，一点也没有，偶尔领到一点土豆干或白菜干，就算不错了。吃的水是从沼泽里挑来的，发黑色，有一股腥气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很多工人都患了一种病症：牙花发黑，嘴唇浮肿，下肢疼痛。沙皇政府根本不顧我們的死活，工地上既没有一个医生，也没有半点药品，生病的人还要被逼着去抬枕木，搬石头，许多人就是这样连病带累地给折磨死了。光我们班三十五个人中，就接连死掉了六个，连一个顶粗壮的大个子（他是天津人，拉黄包车的）也病倒了。那时候人人自危，说不定哪一天嘴唇一肿，就爬不起来了。因而，大家也想尽办法与这种情况作斗争，彭世荣带我們到森林里去采蘑菇，打猎。这一带苔原里，四不象、鹿、豹子很多，我們乘着雪橇，用繩子套捉，常常可以猎取到不少野兽，改善生活。水不好，就化雪水吃。我們就是这样地和恶劣的自然环境、和疾病作着斗争。

更激烈的，是为了保障我們工人的权利而展开的对沙皇政府的爪牙的斗争。

我們的工头，名叫孙川林，生得獐头鼠目，尖嘴缩腮，只要见了这副怪相，就会猜出他是个刻薄鬼。可是，我們三十多个人的工资，偏掌握在他手里，每次发下来，他总要想尽办法克扣。每班有一个伙夫做饭，而这伙食账也是他管的，有他从